

中央研究院
近代史研究所 專刊
(19)

清末革命與君憲的論爭

卮冰峯著

中華民國五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中華民國六十九年六月再版

版 所 翻 必
權 有 印 究

清末革命與君憲的論爭

中央研究院
近代史研究所 專刊 (19)

定價

精裝本新臺幣九〇元 美金二・五元
平裝本新臺幣七五元 美金二・〇元

國外定購另收郵費精平裝美金三角

著 者 元 冰 峯

編印者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發行者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地址：臺灣省臺北市南港
承印者 永裕印刷廠

地址：台北市西昌街一六八號

序

中國自甲午戰後，內憂外患，煎迫愈急，豆剖瓜分，危亡無日。全國有志之士，紛紛從各種的角度去探討當前面臨的危機，從不同的方向去爲國家尋找生存的途徑，於是形成兩種救亡運動，一是以士大夫階級爲中心，一是以全體國民相號召。前者請求清室變法維新，希望將英、日式的君憲制度移植於中國；後者主張革命，決心將數千年的專制政體從根斬去，實現真正的民主政治。

戊戌政變前後，兩派曾經多次醞釀合作，特別是光緒二十五年（一八九九）夏秋之交，幾乎接近成功的階段。但最後還是分道揚鑣，終至發生激烈的論戰。清末民初政治的演變，與此兩派思想的鬭爭，實有直接關係。本書之作，即在由雙方的爭論以探索其勢力的消長與影響。

本書涉及的範圍雖上起甲午（一八九四），下迄辛亥（一九一一），但真正的論戰則是自己亥至庚戌（一八九九——一九一〇）十一年間的事。己亥年維新派的保皇會在海外成立，鼓吹君憲，對革命運動爲一大阻力，同年革命黨的「中國日報」在香港創刊，予以抨擊，雙方的論爭從此開始，並相繼在海內外其他地區展開，直到庚戌年革命黨的「中興日報」在新嘉坡停刊，始大

體告一結束。其中最尖銳的時期是丙午丁未之間（一九〇六——一九〇七）雙方在日本的論戰，本書論述較詳，一方面是由於這場全面性的論戰反映出了革命與君憲兩派思想的全貌，另一方面是因為這一時期的資料都完整的保存下來，在研究上有諸多方便。至於其他地區的有關文獻多屬殘缺，甚或目前在臺灣無直接史料可資援引，只有從時人記載或後人追述中去尋找間接的線索，所以說來不免簡略。此外本書以革命與君憲兩派的論爭為限，故取材以有關論戰的資料為主，其他文獻或為宣傳革命，或為鼓吹君憲，如不涉及論戰的範圍，即統視為參考資料，亦或略而不論。

本書撰述期間，承郭師量宇指導與鼓勵，稿成之後，復蒙核正，並修改多處，著者對其治學的嚴謹態度與獎掖後進的精神，衷心至表敬佩與感激。又，三年前就讀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之時，承曾師虛白指導，對清末革命黨與保皇黨的報業對抗做過初步工作，關於新聞學的概念與報業史的問題得其啓發者不少，茲藉本書出版之際，謹表謝忱。此外，本書付梓之前，承沈雲龍先生校閱一遍，匡正亦多；同事李毓澍、黃福慶先生對所涉及之日文資料曾協助解決疑難；王璽、林明德先生在日本代為複印有關資料；內子李曉蓉為本書製作索引，併此致謝。

中華民國五十五年八月元冰峯序於臺北南港。

清末革命與君憲的論爭

目 錄

序	一—二
第一章 引論	一
第一節 自強運動的回顧與改革運動的醞釀	一
第二節 甲午戰後政治改革運動的兩大主流	九
一 變法維新	一〇
二 國民革命	一七
第二章 革命黨與保皇黨的聯合運動	三三
第一節 革命黨保皇黨兩詞的由來	三三
第二節 兩黨聯合運動始末	三七
第三章 梁啓超的言論及其轉變	五四

第一節	初入報界與嶄露頭角	五五
第二節	入湘以後的激進主義	六一
第三節	亡命日本初期的激烈言論	六六
第四節	遊美東歸後的轉變	八六
第四章	兩黨在香港、上海、南洋、美洲的言論衝突與報業爭奪	一〇四
第一節	公言革命的第一張報紙	一〇六
第二節	蘇報的轉變及其對保皇黨的駁擊	一一一
第三節	南洋、美洲的筆戰與報業爭奪	一二二
一	南洋戰區	一二二
二	美洲戰區	一三二
第五章	民報與新民叢報的大論戰	一四五
第一節	日本留學界的革命思潮與民報的創刊	一五四
第二節	革命利弊辨——召瓜分之說與杜瓜分之論	一六八
第三節	種族革命與政治革命的論爭	一七八

一 種族革命的論爭·····	一七八
二 政治革命的論爭·····	一八九
第四節 社會革命的論爭與土地國有的辨難·····	二〇八
第五節 兩黨論戰的檢討·····	二二九
第六章 結論·····	二三五
第一節 輿論與晚清政潮的關係·····	二三五
第二節 兩黨論爭與政論報刊的關係及其貢獻·····	二四一
第三節 兩黨論爭對清末民意歸向革命的影響·····	二四五
附錄一 參考書目·····	二五三
附錄二 索引·····	二六四

清末革命與君憲的論爭

第一章 引論

第一節 自強運動的回顧與改革運動的醞釀

從鴉片戰爭到甲午之役，前後五十多年間（一八三九——一八九四）的中國政治，都是在洋務運動上打轉。史家稱這一運動爲「自強運動」或「西法模仿」，換言之，就是學習西洋的船炮器械，以達國家富強的目的。尤其是從太平天國滅亡到中日戰爭爆發的三十年間（一八六四——一八九四），政治上的中心問題，更是集結於這一焦點。因爲當年湘淮軍的首領們，成了這一期掌握政柄而通達時勢的人物，他們在過去的戰役中，曾親身體驗到西人洋鎗大砲與火輪戰船的威力，於是越發覺得船堅砲利是富國強兵的不二法門，認爲「中國但有開花大砲輪船兩樣，西人即可斂手」，^①只要學得西人火器輪船的秘巧，能自製用，就可「平中國有餘，敵外國亦無不足」了。^②

於此可見當時的所謂士大夫，雖然還有一部人仍把西洋的軍火機器目爲奇技淫巧，而且對言

西學者「詆爲漢奸，不齒士類。」^③但稍具洋務知識的人，却不得不對西洋船炮的威力感到震驚。特別是英法聯軍之役，園囿被焚，宗社蒙污，城下之盟的恥辱更無法容忍，也無法忘却！因此，覺得這個世界，就是一個鐵艦槍砲的世界，凡是要想立國，要想富強者，就不能不把船炮視爲「第一要圖」。^④船炮是西洋人的長技，中國模仿西法，就是要學習西洋人的長技以抵禦西洋人。於是「師夷之長技以制夷」^⑤，便成了自強運動的方針與路線。

這就是主持自強運動者的「經國之略」，這就是他們認爲中國橫遭陵辱之後，「如病方亟」，不得不「取外人之長技以成中國之長技」的「治標」辦法。^⑥但是效果如何呢？到甲午戰爭就給這三十年的努力作了否定的答案。當中日戰爭爆發時，中國的船炮多於日本，而却慘遭敗績，數年來苦心經營的北洋海軍，幾乎全被日本摧毀。至此，「西法模仿的成績歸於泡影！」^⑦

戰敗的教訓，使人憤恨，使人覺醒，使人不得不對自強運動表示懷疑。梁啓超批評當時主持洋務運動的李鴻章，「知有兵事而不知有民政，知有外交而不知有內治。」^⑧正可以說明三十年來的自強運動，走的是一條錯誤的路線。梁氏甚至把甲午戰爭失敗的原因，也完全歸咎於這一運動。他說：

甲午以前，我國士大夫未言西法者，以爲西人之長，不過船堅炮利，機械精奇，故學之者，亦

不過炮械船艦而已，此實我國致敗之由也。^⑩

梁氏的看法雖過於單簡，但可代表當時士大夫的心理，他們對於三十年來的自強運動，有了新的估價，也有了新的覺悟，知道西洋所以富強，並不是全靠船炮器械，而政治修明，學術發達，則為重要因素。中國自鴉片戰爭以來，即言西法，講洋務，然而所注重者，不過船炮，對西洋的政治學術，並不過問，因此到甲午才一敗塗地。所以梁啓超又說：

盡此六十年中（一八四〇——一九〇〇），朝士即有言西法者，不過稱其船堅炮利，製造精奇而已；所採用者，不過炮械軍兵而已。無人知有學者，更無人知有政者。自甲午東事敗後，朝野乃知舊法之不足恃，於是言變法者乃紛紛。^⑪

至此憂時之士才恍然覺悟，要國家富強，不是單靠學習西洋器械的皮毛，必須在政治制度及教育學術方面來一番興革。但是這種思想並非始自甲午以後，早在甲午以前就有人倡導過，而且維新的言論，亦非始自康、梁一派，在康、梁之前這種言論「已有彌漫天下之勢」，^⑫如馮桂芬、郭嵩燾、王韜、薛福成、鄭觀應、何啓、胡禮垣等人的言論，都是針對時弊而發出的政治主張。不過當時困於守舊之習，認為祖宗之法，不可或改；朝野上下又多自尊自大，視外國為蠻夷，認為中國的文物制度，遠勝西洋的獠狃之俗，以及主持自強運動者過於迷信西洋火器的種種關係，

以致政治改革的觀念不被人接受。直到甲午一役，這才驚醒了「四千年之大夢」，^⑬翻然圖改，而講求新政了。^⑭

以往的自強運動，不惟不能使西人斂手，就連東瀛小國日本的侵凌也無法招架，一時李鴻章成了衆矢之的，怨毒集於他的一身，但無補於實際的危機。在痛定思痛之餘，知道過去的舊路子——洋務運動，不是通往富強的大道，必須另覓新的途徑。新的途徑是甚麼？就是政治改革，就是變法。所以康有爲在光緒二十四年正月初八日（一八九八年一月二十九日）上疏說：

觀大地諸國，皆以變法而強，守舊而亡。然則守舊開新之效，已斷可觀矣。以皇上之明，觀萬國之勢，能變則存，不變則亡；全變則強，小變仍亡。皇上與諸臣審知其病之所源，則救病之方，卽在是矣。夫方今之病，在篤守舊法，而不知變，處列國競爭之世，而行一統垂裳之法，此如已夏而衣重裘，涉水而乘高車，未有不病渴而淪胥者也。^⑮

這就是公然的說，中國若不甘於弱亡而欲富強，非變法不可。但要如何變呢？康有爲在同疏中又說：

若夫美法民政，英德共和，地遠俗殊，變久跡絕。臣故請皇上以俄大彼得之心爲心法，以日本明治之政爲政法也。然求其時地不遠，教俗略同，成效已彰，推移卽是，若名書佳畫，墨

跡尙存，而易於臨摹，如宮室衣裳，裁量恰符，而立可鋪設，則莫如取鑑於日本之維新矣。^⑮康有爲主張變法要走日本的路子，是因爲中日兩國國情相似，日本變法而強，正好做了我們的前驅。「若中國變法，取而鑑之，守舊之政俗俱同，開新之條理不異，其先後次第或緩或急，或全或偏，舉而行之，可以立效。其行而乖謬者，吾可鑑而去之；其變而屢改者，吾可直而致之。但收日人已變之成功，而舍其錯戾之過節。日本爲其難而我爲其易，日本爲其創而我爲其因。按跡臨摹，便成圖樣。」^⑯此外，日本維新之後，實行憲政，國勢日強，甲午一戰，擊敗中國，亦是國人認爲是中國變法的絕好榜樣。^⑰梁啓超所謂「中國維新之萌蘖，自中日之戰生」，^⑱是不無道理的。

除了甲午戰敗的刺激外，外患的壓迫，也是促使變法運動急遽發展的重大因素。光緒二十三年十月（一八九七年十一月）德國強佔膠州灣，十一月，俄國強據旅順，瓜分之禍，迫在眉睫，舉國爲之震驚。康、梁以爲人心振奮可乘，乃在京師展開變法的活動，光緒皇帝對軍機大臣詰問時事時，亦主急需變法。^⑲於是到光緒二十四年（一八九八年）的春間，變法圖強的空氣，已是囂然塵上，有不可遏止之勢了。

甲午戰爭的失敗，在中國朝廷上掀起了一個政治改革的大波瀾；同時在民間也正進行着一股

革命的狂潮，這就是孫中山先生所倡導的國民革命。中山先生於中法戰敗之年（一八八五），已決志傾覆清廷，^②嗣後即在廣州、澳門、香港一帶，結納同志，從事活動，至甲午中東戰起，以爲有機可乘，乃赴檀香山，糾合海外華僑而創立興中會，^③由鼓吹的階段，進入「正式的組織和積極的行動」^④時期。

中山先生所倡導的革命運動，康、梁所發起的變法維新，均係醞釀在甲午以前，又都是爆發於甲午以後，所以甲午戰爭不啻作了這兩個運動的引火線。蔡鍔有一段話最可說明這一時期的局勢。他說：

甲午一役以後，中國人士不欲爲亡國之民者，羣起以呼嘯叫號，聲撼大地，或主變法自強之議，或吹煽開迪民智之說，或故立危詞以警國民之心，或故自尊大以鼓舞國民之志。未幾而薄海內外，皆懼爲亡國之民，皆恥爲喪家之狗。未幾而有戊戌變法自強之舉，此振興之自上者也。未幾而有長江一帶之騷亂，此奮起之自下者也。未幾而有北方諸省之亂，此受外族之憑陵，忍之無可復忍，乃轟然而一爆者也。^⑤

蔡鍔所記的三事，除戊戌變法外，其他二事，乃是指國民革命與庚子拳變而言，前者即長江一帶之騷亂，後者即是北方諸省之亂。平心而論，除庚子拳變在行動上較爲愚昧與偏激之外，國

民革命與戊戌變法，皆爲甲午戰後，由於民族自覺而發生的救國運動，一個代表振興之自上的士大夫階級，一個代表奮起之自下的全體國民。甲午戰役之後，這兩個救亡圖存的運動，便在士大夫階級與全體國民兩條不同的路線上積極進行。

- ① 李文忠公全書，朋僚函稿卷三，頁一九（同治二年四月初四日；一八六三年五月二十一日，「上曾相」書），光緒戊申（一九〇八）印行，金陵。
- ② 同上，頁一六一—一七（同治二年三月十七日；一八六三年五月四日，「上曾相」書）。
- ③ 梁啟超：戊戌政變記，飲冰室合集，專集之一（第一冊），頁二一，中華書局，民國三十六年再版，上海。
- ④ 薛福成：出使英法義比四國日記，卷二，頁三，光緒十六年二月初六日（一八九〇年二月二十四日）記，庸齋全集（），光緒壬辰（一八九二）上海醉六堂石印。
- ⑤ 魏源：海國圖志敘，海國圖志（），頁一，光緒二年（一八七六）甘肅慶涇固道署重刊本。
- ⑥ 李文忠公全書，奏稿卷九，頁五（同治四年八月初一日；一八六五年九月二十日，「置辦外國鐵廠機器摺」）。
- ⑦ 李劍農：中國近百年政治史上冊，頁一二一，商務印書館，民國四十八年二版，臺北。
- ⑧ 梁啟超：中國四十年來大事記（一名李鴻章），飲冰室合集，專集之三（第二冊），頁四一。
- ⑨ 梁啟超：戊戌政變記，飲冰室合集，專集之一（第一冊），頁二七。
- ⑩ 同上，頁二二。
- ⑪ 蕭公權：中國政治思想史（），頁七八四，中華文物出版事業委員會，民國四十三年再版，臺北。蕭著「中國政治思想史」（第二十三章「戊戌前後之維新思想」，於戊戌前列舉馮桂芬、張之洞、何啓、胡禮垣等人，詳爲論述（頁七八一—八〇三），嘗謂「當時人士可論述者雖不止此，而維新論者之主要態度殆已略盡於此。」此外郭嵩燾之「使西紀程」、王韜之「變法」及「變法自強」諸篇，薛福成之「出使日記」及「籌洋芻議」，雖不具代表性，而對當時似亦發生相當影響。特別是鄭觀應之「盛世危言」，刊於光緒十八年，及戊戌之歲，重刻頻仍，殆已爲膾炙人口之論。其言維新，思想

或更澈底，其序言嘗謂：「六十年來萬國通商，中外汲汲，然言維新，言守舊，言洋務，言海防，或是古而非今，或逐末而忘本，求其洞見本原，深昭大略者，有幾人哉？孫子曰，知己知彼，百戰百勝，此言雖小，可以喻大。應雖不敏，幼穉書史，長業質遷，憤彼族之要求，惜中朝之失策，於是殫西文，涉重洋，日與彼都人士交接，察其習尚，訪其政教，考其風俗利弊得失盛衰之由，乃知其治亂之源，富強之本，不盡在船堅炮利，而在議院上下同心，教養得法。興學校，廣書院，重技藝，別考課，使人盡其才。講農學，利水道，化瘠土為良田，使地盡其利。造鐵路，設電線，薄稅斂，保商務，使貨暢其流。凡司其事者，必素精其事。為文官者，必出自仕學院。為武官者，必出自武學堂。有升遷而無更調，各擅其長，名副其實，與我國取士之法不同。善夫張靖達公云，西人立國，具有本末，雖禮樂教化遠遜中華，然其馴至富強亦具有作用。育才於學堂，論政於議院，君民一體，上下同心，移實而戒虛，謀定而後動，此其體也。輪船火炮，洋槍水雷，鐵路電線，此其用也。中國遺其體而求其用，無論竭蹶步趨，常不相及，就令鐵鑪成行，鐵路四達，果足恃歟！然我國深仁厚澤，初定制度，盡善盡美，不知今日海禁大開，勢同列國，風氣一變，以至於此。易曰，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年來當道講求洋務，亦嘗造槍炮，設電線，建鐵路，開礦織布以起而應之矣，惟所用機器，所聘工師，皆來自外洋，上下因循，不知通變。德相卑士麥謂我國只知選購船炮，不重學藝，不與商務，尚未知富強之本，非虛言也。」又，參看郭廷以「近代西洋文化之輸入及其認識」，大陸雜誌第三卷第七期，頁二五—二七，民國四十年十月十五日出版，臺北。

⑫ 梁啟超：戊戌政變記，飲冰室合集，專集之一（第一冊），頁一二三。

⑬ 康有為：保國會演說詞，左舜生：中國近百年史料初編，頁五〇—五〇三，中華書局，民國二十五年七版，上海。

⑭ 康有為：應召統籌全局摺（戊戌正月初八日），戊戌奏稿補錄，頁一二，宣統三年，上海。

⑮ 同上，頁三。

⑯ 康有為：日本變政考序，日本變政考，頁一，南海叢書，未刊。

⑰ 蕭一山：清代通史四，頁二〇七五，商務印書館，民國五十二年初版，臺北。

⑱ 梁啟超：中國四十年來大事記，飲冰室合集，專集之三（第二冊），頁四二。

⑲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事日誌第二冊，頁九八三，民國五十二年蒙初版。

②① 「孫文學說」，國父全集(二)，頁八〇，中央文物供應社，民國四十六年改版，臺北。

②② 同上，頁八一。

②③ 張繼：五十年歷史之研究與回顧，張溥泉先生全集，頁二三，中央文物供應社，民國四十年一版，臺北。

②④ 奮勵生(蔡錦)：軍國民篇，新民叢報第一號，頁七九，光緒二十八年正月初一日(一九〇二年二月八日)，日本橫濱。

第二節 甲午戰後政治改革運動的兩大主流

十九世紀中葉，西方帝國主義，攜其工業革命的成果向東方作政治經濟及軍事的大規模侵略。中國首當其衝，到十九世紀末葉，已成俎上之肉，「瓜分豆剖，漸露機牙。」^①四鄰交逼，危亡無日，於是有志之士遂漸覺醒而掀起了救亡圖存的運動。戊戌維新固屬「清季變法運動最驚人之一幕」，^②而國民革命尤為「沛然莫之能禦」的洪流。^③「變法失敗則轉為憲政，革命成功則建立共和。」此二者在表面上為對立的兩派，且互相排詆，終至演成激烈的論戰，但「實而按之，則亦有相反相成之功。蓋不有革命之醞釀，則清廷未必肯實施憲政；不有憲政之宣傳，則人民未必傾心共和。」^④

終有清之世，革命與變法始終是晚清政潮中的兩道主流。在本質上這兩個運動均屬救國運動，以其最後的宗旨相同，所以雙方曾有多次的聯合醞釀，但始終沒有成功。揆其原因，彼此所